

孔子当代媒介形象嬗变研究——以《文史哲》杂志为例

王滢越, 苏曼, 封叶, 孟玲萱

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 102600

DOI:10.61369/HASS.2025030019

摘要： 本研究以 1951—2019 年为时间跨度，选取《文史哲》杂志为个案研究对象，深入探究当代孔子媒介形象的嬗变。通过分析可知，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社会背景、文化政策和传播媒介等因素，深刻影响了孔子媒介形象的呈现。《文史哲》杂志也因其类型和定位的不同，在报道主题、语言风格、受众定位等方面呈现显著特征。本研究为深入理解孔子形象的历史演变和文化意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在新时代的传承、传播及创新发展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孔子；媒介形象；文史哲；传统文化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Confucius' Contemporary Media Image — Taking the Magazine "Wen Shi Zhe" as an Example

Wang Yingyue, Su Man, Feng Ye, Meng Lingxuan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Beijing 102600

Abstract： This study spans the period from 1951 to 2019, selecting the journal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s a case study to delve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us's media image in contemporary times. Analysis reveals that political environments, social contexts, cultural policies, and media channels have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portrayal of Confucius in the media. The journal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lso exhib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its reporting themes, language style, and target audience due to its unique type and positioning. This research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Confucius's image, contributing to the inheritance, dissemin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onfucius; media imag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traditional culture

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跨越了多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政策与大众传播媒介等都经历了深刻变革。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标志性人物，其媒介形象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时期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本研究致力于系统梳理 1951 年—2019 年《文史哲》杂志中的孔子媒介形象演变，探究其中的演变路径，深入剖析引发其形象变化的多种驱动力。通过对孔子这一典型形象的深度研究和发掘，以明晰传统文化传播与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入剖析媒介在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中的运行机制，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交流和传播提供借鉴和参考。

《文史哲》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山东大学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自创刊以来，《文史哲》以其所蕴含的深厚历史底蕴和卓越文化价值，在引领重大学术争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培养学术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刊物大量收录了与孔子形象相关的文章，文章切入视角丰富、内容质量高，具有重要的阅读和研究价值。

一、《文史哲》杂志中孔子媒介形象的发展变化

（一）1951—1965：多维观察，综合评价

这一时期，正值新中国建立后的关键发展阶段，国内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相对宽松，到“反右”运动的激烈批判，再到“大跃进”和“四清”运动的开展，政治氛围日趋紧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象征的孔子，其媒介形象的塑造与重构，不仅反映了学术思想的变化，更折射出深刻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变革的需要。

在此期间，《文史哲》杂志上刊登的相关学者文章对孔子的

研究呈现学术化、专业化、多维度的特点。这些论文主要围绕孔子思想展开多方面探讨，在分析方法的运用上，既有基于翔实史料的细致梳理，也有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等新方法的深入探究，为全面解读孔子思想提供丰富视角与深刻见解。例如在《略论孔子思想的阶级性》《孔子的时代、阶级和政治思想的进步性》《从周代的奴隶法谈到孔子思想的阶级性》《关于孔子思想讨论中的阶级分析的几个问题》等文中，通过分析孔子对“杀殉”制度、晋铸刑鼎的评价，反映了他具有新兴地主阶级意识的先进性和思想的进步性，对于社会政治变革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从 1957 年开始，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学术界对孔子

的评价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倾向。这一时期的相关论述往往采取“批判继承”的立场，在承认孔子思想具有阶级局限性的同时，也肯定其历史贡献，体现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审慎态度。如在《对孔子评价的一点意见》中，文中坚决反对将孔子简单定性为“代表旧的统治阶级即领主阶级的利益”的观点，并强调孔子所代表的士阶层是“当时一个新兴的阶层”，这个阶层的许多思想和行动应该得到肯定。^[1]这种辩护性论述在1962年出现并非偶然，当时正值“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实施期间，学术环境相对宽松。作者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试图在政治正确与学术真实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引用《论语》中“节用而爱人”等语句，论证孔子具有“重人事”的进步思想，这种解读方式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对“唯物论”的推崇，又为孔子保留了一定的正面形象。

回顾1957—1965年孔子媒介形象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统文化符号如何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被不断重新定义和利用，这一过程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逻辑，也展现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复杂性。

（二）1966—1976：极左思潮，负面主导

在1966—1976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孔子媒介形象呈现出被严重污名化的特点。例如，在“批林批孔”运动大肆盛行时，《文史哲》杂志1974年第1期上近八成的文章都是以“批林批孔”为主题，体现了当时的文化发展受政治因素影响之深。其中，《从孔府办的“四氏学”看“有教无类”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一文中强烈批判力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并以孔府所办的“四氏学”“完全是为地主阶级集团利益服务的”“专为反动统治阶级驯养帮凶和爪牙的场所”为证据支持^[2]；《批判“天命观”，树立革命观——从曲阜县夏家村的发展看孔丘“天命观”的反动性》提出夏家村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二十余年的奋斗将家乡建设成为新乡村，是对孔子“天命观”的最好驳斥^[3]；《孔丘“孝道”的反动性》一文中，作者借其实地调查孔府解放前遵循孔子遗教，利用孝道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模糊民众的阶级意识来说明孔子鼓吹的“孝道”所具有的反动性质。^[4]这些文章或错误解读了孔子思想的真正内核，从而使其服务于政治斗争；或没能将孔子置于其所在的时代背景、客观条件中去，放大了其思想上的局限性；或受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影响，对孔子思想进行盲目批判。但是，尽管其中部分描写深受当时的历史背景影响缺乏客观性和辩证性，却也体现着人们反抗压迫、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

（三）1977—1999：拨乱反正，趋于客观

1978年至20世纪末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关键时期，《文史哲》作为一部较具代表性的专业类学术期刊，也在积极顺应时代发展实现学术研究领域的突破发展，其刊录的相关论文既反映了思想解放的进步性，也暗含意识形态重构的复杂逻辑。同时，这一时期《文史哲》期刊中对于孔子的研究逐渐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涵盖思想文化、教育理念、军旅政治、哲学价值等众多方面，丰富了人们对孔子思想的认识，逐渐端正了人们对于孔子形象的客观认知。

仅在1978年，《文史哲》便刊登了3篇与孔子直接相关的论文。其中，在《孔子认识论评价中的一个问题》中，作者葛懋春提出孔子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其中涉及一些不合理的内容，应该加以认真批判，但在感性与理性认识过程等方面有一定价值；在《学习毛主席有关孔子论述的一些体会》一文中，作者从三方面评价了孔子的思想体系，并指出“即使对孔子思想中某些有用的东西，也不能照搬照用，而是借用它的语言，注入新的内容”。^[5]从这些文章的选题和切入点，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学界对于孔子的研究和评价逐渐回归至理性、客观的轨道上去，内容也更侧重于学术研究而非政治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专门针对孔子形象、孔子思想进行评价和解读的相关研究，这不仅标志着学界对于孔子形象的认知和定义逐渐走向重新审视并客观评价的道路，还反映了学界的思辨精神，他们致力于还原孔子的真实面貌，并将其中先进理念的应用于社会发展。通过对相关文献检索高频词可知，这一时期的孔子研究是“启蒙与反启蒙的合题”^[6]。对此，匡亚明同志曾经说过：“讨论孔子，弄清中国社会历史分期很重要。”^[7]在《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述略》一文中，解洪祥提出多数同志认为鲁迅对孔子的态度是既批判又肯定，鲁迅对孔子、孔学乃至传统文化的态度具有复杂性，不能简单认为他是单纯的反孔或尊孔，其思想受到时代背景和自身文化积淀的双重影响。在《历史价值范畴里的符号选择——鲁迅批孔新议》中，作者孔范今也指出鲁迅的批孔“实际上是在历史价值范畴里的符号选择，不必把这一历史行动硬拉到当代评孔的学术范畴里来自寻烦恼。”^[8]《论郭沫若“五四”时期对孔子的“曲解”》一文中，作者由郭沫若在“五四”时期蔑视传统、蔑视偶像却大力褒扬孔子的反差现象引入，详细分析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并指出这种“曲解”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有其必然性，是他在孔子身上寄托自身人格理想、试图创造新价值观的表现，且符合文化发展中“曲解”现象的普遍性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独特思考。而《重新读解孔子的智慧——兼及20世纪的文化批判问题》则提醒我们如今重新解读孔子思想，需要超越历史局限、辨析其多元价值，对反思历史和传承文化意义重大。

（四）2000—2019：日益深化，全新拓展

20世纪以来是中国文化战略从“传统复兴”迈向“全球输出”的关键时期，孔子形象被重塑为兼具本土文化根基与国际普世价值的象征。在全球化与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文史哲》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和前沿的研究视角，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深入剖析孔子思想的内涵与价值，为孔子形象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与发展，许多文章对待儒学、对待孔子的分析研究也有了更全面和系统的理解与表达。例如，《孔孟仁说异同论》和《“善”与“善的生活”：孔子与基督》等文章，将孔子与其他著名历史人物相对比或结合分析，作为研究孔子的重要切入点。《从批孔到释孔的转折》一文中，宋志明将批孔定义为“中国现代哲学的生长点，开启了中国哲学的新局面”。他认为自20世纪初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中国学人对于孔子的

态度大体经历了“从以批孔为主到以释孔为主的过程”。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现代新儒学思潮、实证哲学思潮三大派“都致力于建立各自的儒学观，试图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9]这与2000年后官方“文化自信”政策相呼应，通过消解儒学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强化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在新世纪，它们将会持续互动并焕发活力。作者对儒学充满信心，也期待着它与现代社会所兼容，从而具有更积极的价值。同时，《对话圣贤与经典——孔子成圣之路与先秦诸子经典的形成》这篇文章系统地叙述了孔子相貌、形象的“神化”过程及其原因分析，同时也叙述了孔子的负面形象及相关例证，也正如这篇文章的主题所说的那样，“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形象的神化、成圣之路，也就是先秦诸子经典文本的形成过程。”^[10]由此看来，新时代如何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实现二者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成为文化界和政教界正在不断思考的问题。

二、《文史哲》杂志对孔子形象塑造的特点

（一）报道主题与侧重点

在对孔子的报道中，《文史哲》在报道主题和侧重点上呈现显著特征，这与其自身定位和文化功能密切相关。《文史哲》的定位为学术期刊，侧重于对孔子思想的学术研究，在相关文章的主题呈现上更具专业性和学术性，其报道主题多聚焦于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深入研究，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通过深入挖掘孔子思想的学术内涵，来推动孔子思想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二）语言风格与叙事方式

《文史哲》作为学术期刊，主要收录专家学者的研究型文

章，其语言风格更具学术性和专业性，对学术规范和专业要求也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文史哲》在对孔子形象及儒家思想进行研究和阐述时，注重综合运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 and 文献研究法、案例解读法、数据分析法等多种方法进行创新研究，揭示孔子思想的内涵和价值，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

（三）受众定位与传播效果

《文史哲》的受众则主要是学术界的专家学者、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以及对人文社科研究感兴趣的人群，这些受众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和专业知识，对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创新性有较高的要求。因此，《文史哲》上刊登的相关文章，更能体现孔子形象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发展的专业性和前沿性，使孔子形象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了更加全面、深入的阐释和塑造，促进了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从而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

三、结束语

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媒介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复杂嬗变，映射出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刻变迁。通过分析《文史哲》杂志对孔子形象的刻画演进，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政治环境、文化政策等因素对孔子形象塑造的深刻影响。

未来，我们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要以更加客观、全面的态度看待孔子及儒家思想，突破传播局限，平衡好意识形态引领与文化多元性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孔子文化的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促进其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绽放光彩，实现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 [1] 王仲举. 对孔子评价的一点意见 [J]. 文史哲, 1962, (05): 20-21.
- [2] 李观安, 郑广玲. 从孔府办的“四氏学”看“有教无类”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J]. 文史哲, 1974, 0(1): 7.
- [3] 胜天. 批判“天命观”，树立革命观——从曲阜县夏家村的发展看孔丘“天命观”的反动性 [J]. 文史哲, 1974, 0(1): 8.
- [4] 胡维华, 孙守坤, 王宗慧. 孔丘“孝道”的反动性 [J]. 文史哲, 1974, 0(1): 9.
- [5] 蔡尚思, 李华兴. 学习毛主席有关孔子论述的一些体会 [J]. 文史哲, 1978, 0(6): 4.
- [6] 许纪霖. 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 [7] 匡亚明同志谈研究孔子问题 [J]. 文史哲, 1982, 0(6): 12.
- [8] 孔范今. 历史价值范畴里的符号选择——鲁迅批孔新议 [J]. 文史哲, 1992, 0(2): 11-18.
- [9] 宋志明. 从批孔到释孔的转折 [J]. 文史哲, 2001, (03): 26-31.
- [10] 钟书林. 对话圣贤与经典——孔子成圣之路与先秦诸子经典的形成 [J]. 文史哲, 2016, (02): 76-90+166-167.